

#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空间演变研究

——以厦门市蔡塘社区为例

陈 焯<sup>1,2\*</sup>

(1.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 510000;  
2. 广东省可持续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0)

**摘要:**在空间生产视角层面而言,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其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本研究以厦门市蔡塘社区为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探讨城中村微观物质空间的演变。通过参与式观察、口述历史、问卷访谈等多种途径,分析蔡塘社区的物质空间形态、社会空间形态,研究发现蔡塘社区的内在演变机制主要为产业、地价、人口三个方面,电商经济兴起导致社区沿街商铺格局朝小规模化发展,周边地价升值促使街道空间密度提高,社区居民年轻化影响街道空间业态精细化和多元化。本研究剖析了蔡塘社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演变规律,以期为城中村改造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以及为城中村改造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展思路。

**关键词:**空间生产;空间演变;城中村;厦门;蔡塘社区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志码:**J **文章编号:**1672-2736(2024)08-0016-11

##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社会现象,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城中村不仅是城乡过渡的特殊空间,更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自1993年城中村概念首次被提出以来,人们便意识到粗放型城市扩张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sup>[1]</sup>。城中村的形态相较于城市社区存在显著差异,多年的无序建设导致建筑密集,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与空间协同不够导致加剧向心交通压力<sup>[2]</sup>,缺乏公共设施及优良公园绿地等自然景观供居民享用。这些空间形态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结构异化,亟需深入分析其演变过程,揭示内在的空间与社会活动规律。

空间生产理论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强调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由“空间的实

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个层面构成,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社会关系和物质空间<sup>[3]</sup>。空间生产视角下,城中村的演变不仅是物理形态的变化,更蕴含了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文化认同的深刻变迁。

本文将厦门市蔡塘社区为例,探究其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空间生产机制。研究旨在揭示城中村如何通过自发性社会经济活动形成独特空间结构,并在此过程中映射出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城市发展的冲突。通过对蔡塘社区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为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生产提供新视角,并为未来的城市规划与社区更新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 1 相关研究综述

城中村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因其本身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和矛盾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sup>[4]</sup>。城中村的形成与演变受到社会

基金项目: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基金项目“城市交通与国土空间利用互动评价技术研究”(KYHT-2024-02)。

经济<sup>[5]</sup>、人口构成<sup>[6]</sup>、政策制度<sup>[7,12]</sup>等多因素的影响,有关于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机制和空间形态两个方面。

制度机制方面,刘文清等学者构建分析框架,总结南通市区域城中村城乡体制、经济模式、规划管理等方面的一般演进规律,总结其形态演变困境及机制<sup>[8]</sup>;陈静等学者通过实证调查,总结郑州城区内城中村的形成、演变及驱动机制<sup>[9]</sup>。

空间形态方面,仝德等以深圳市区 91 个城中村为对象,基于建筑普查数据,从建设总量、占地规模、开发强度等方面分析城中村演变特征及规律<sup>[10]</sup>;刘毅华等研究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剖析了城中村空间和功能分化特征,以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sup>[11]</sup>。

总而言之,有关于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机制方面的探索,以及空间形态演进规律方面的分析,但鲜有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对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变,以及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等内容进行深入剖析。随着城中村的视角愈加丰富,其相关研究仍然需要结合表面的物质空间以及内在的社会关系等视角不断深入。

## 2 厦门市蔡塘社区空间演变探究

### 2.1 研究区域概况、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 2.1.1 研究区域概况

自 1980 年成为经济特区以来,厦门经历快



图 1 宏观区位

速的城镇化进程,其核心区域厦门岛已进入成熟建设阶段。至 2022 年,厦门岛内共有 42 处城中村,占已建设用地面积的 14.3%,成为城市宝贵的存量空间资源。鉴于岛内建设用地稀缺,增量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城中村改造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关键策略。进入存量发展时代,研究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变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改造策略、激活存量空间及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sup>[13]</sup>,也是厦门实现“高素质、高颜值”城市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城中村改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厦门城市功能的重塑、品质提升及社会融合程度。

蔡塘社区宏观区位如图 1 所示,微观区位如图 2 所示,坐落于厦门岛湖里区与思明区交界,紧邻湖边水库,辖区面积约 1.25km<sup>2</sup>,包括蔡塘社和古地石社两个自然村。社区常住人口 2126 人,外来流动人口达 54851 人,外来人口占比高达 96.3%。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扩张,蔡塘逐渐从“城郊村”转变为“城边村”,最终被建成区包围,成为典型的城中村,其区位演变历程清晰反映了这一过程。

#### 2.1.2 研究方法

(1)参与式观察法。在进行实地研究过程中,以社区观察者的身份在蔡塘社区内居住了两日,通过对蔡塘社区内日常生活轨迹的观察,收集关于居民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资料。

(2)问卷及访谈法。通过对村民、周围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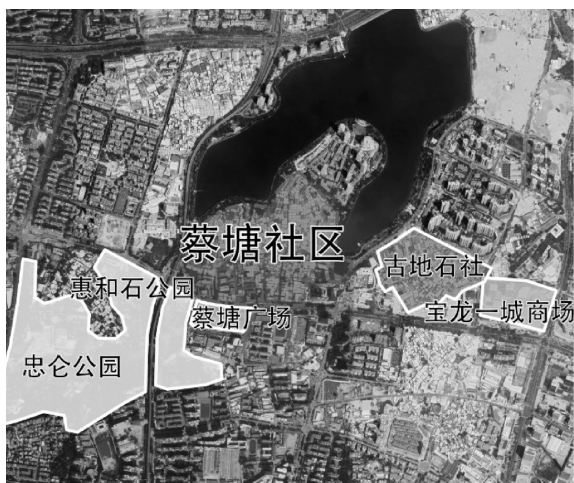


图 2 微观区位

政府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了解各方目前对蔡塘社区及周围地区的生活环境的评价,和对蔡塘社区未来发展的愿景,作为对现状深入剖析和后续建议的基础。

(3)口述历史法。通过对当地住户口中访谈,记录他们对村庄从乡村聚落演变为城中村的回忆和陈述,作为对村庄演变过程的历史资料补充。

### 2.1.3 调研数据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随机采访蔡塘社区和周边共 110 位居民,旨在剖析其城中村中的内在社会关系。调研选取工作日的一天进行开展,主要聚焦于社区邻里关系、社区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社区未来发展的愿景等关键问题进行访谈。

尽管外来人口的数量显著超过本地村民,但二者之间维持着和谐的共处关系,村内的主体(村民)与客体(外来人口)之间关系融洽。就村宅建筑而言,旧式房屋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不乏一部分是在拆迁公告公布后,为应对变迁而重建或扩建的新式住宅。村民对当前的生活状况

普遍持较为满意的态度,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具有多样性,其中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是较为突出的两大议题。就社区的未来发展愿景而言,在房租收入能够保障基本生活、而安置补偿的具体方式尚不明晰的双重背景下,蔡塘社的村民多数全面拆迁的决策采取了审慎的观望立场(如图 3、4、5、6 所示)。

## 2.2 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变分析

根据村民的口述信息,本地人普遍认为主街是蔡塘社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空间,通过搜集蔡塘社区的演变资料,发现该条街道历史久远、空间环境、商业业态也变化极大,因此本次研究选定主街作为村庄形态演变的主要分析对象。

### 2.2.1 物质空间形态

(1)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强度是物质空间形态的具体表现,与城市形态联系密切。从卫星图和实地访谈中可以得知,蔡塘社区主街在近十年内在土地利用上没有太大的调整。在实地调研中,采访了一位在主街上有十五年开店经历的店主,他表示,蔡塘主街从 2003 至今整体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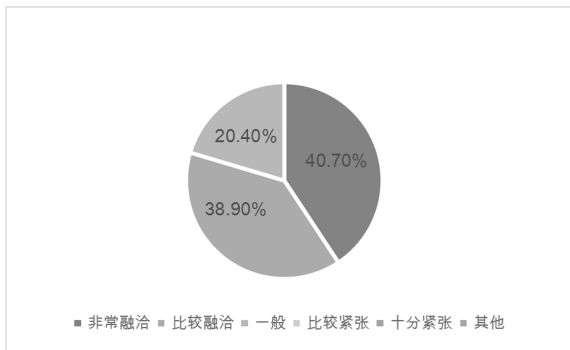


图 3 社区邻里关系调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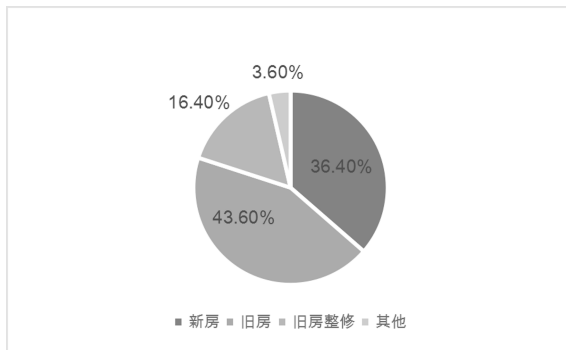


图 4 居民房屋质量情况调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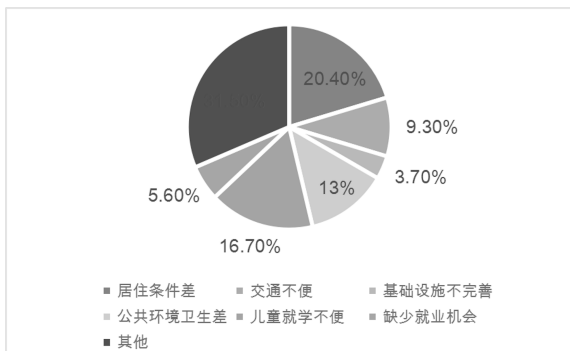


图 5 社区存在问题调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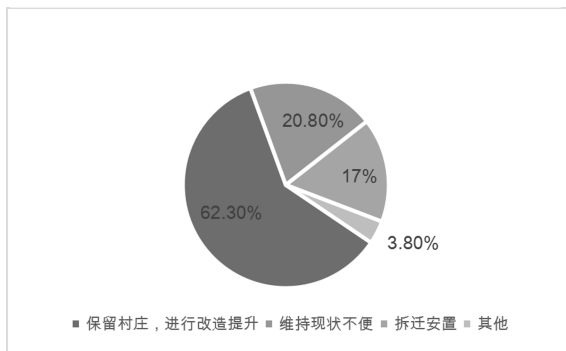


图 6 社区未来发展意愿调查结果



图7 蔡塘社区主街研究范围

化较小,主要的变化在于主街上商铺的种类变多了,但是在土地使用上(房屋的新建,公共空间的打造)变化较小,容积率没有太大变化。原因主要是:一是政策的规定,城中村内的建筑不得私自改建(实际情况是许多建筑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或多或少的加建);二是主街的所承担的功能比较稳定,房屋的拆建会对街道功能的使用造成影响(如图7所示)。

(2)用地功能和业态混合度。通过实地的调研,可以对蔡塘社区主街两侧的用地混合度进行大致的划分:主街两侧建筑的功能主要为居住,这些建筑的一层业态有小型商场、餐饮、日杂店等等,形成下部底商、上部住宅的多功能用地,而上部住宅多是出租房。除了一些商业性为主的店铺,主街上还有独立的幼儿园(现已被征用为蔡塘征迁工作组办公处)以及菜市场、停车场、由建筑后退而形成的公共空间等。主街上商业的形式除住宅一层的店铺之外,还有许多摆在店铺门外的移动摊点,多以食品贩卖为主。由此可以判断,蔡塘社区主街的主要功能以满足日常生活为主,同时还承担着交通和休闲娱乐的功能。

(3)空间肌理分析。城市空间肌理反映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特色,其因地域而异,并与当地的社会生产生活、技术水平紧密相连。居住方式、历史传承、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交通结构,都是塑造城市肌理的关键因素。同时,通过观察城市肌理,可以洞察到居民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状态。

通过分析蔡塘社区的整体空间肌理,可以发现整个蔡塘社区的建筑体量差异较大,布局较为混乱,这是由于蔡塘社区原本是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的乡村,部分以机械生产的大厂房保留至今,仍保留工业生产功能,有部分厂房建筑则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功能置换。大部分厂房形状较为规整,建筑周围的留出退缩空间用于物资的交通运输,但是在厂房功能转变之后,一些原本的交通空间被居住建筑占领,厂房周围的空间肌理开始变得凌乱无序,这个变化在西北侧和东北侧较为明显。

结合卫星图和实际访谈,对蔡塘社区主街的空间肌理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主街的空间肌理在过去的十年内并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在

表1 不同交通方式下不同时间成本的可达性范围

数量业态	食杂店(家)	便利店(家)	折扣店(家)	百货店(家)	专卖店(家)	超市(家)	总数(家)
2015年	33	6	48	9	13	1	110
2020年	28	10	35	4	7	1	85



图 8 主街现状主要业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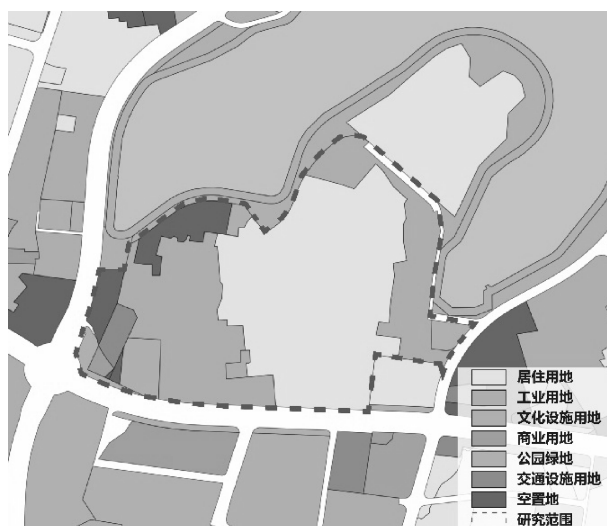


图 9 蔡塘社区土地利用现状

调研的前期准备中,对卫星图上变化的建筑和空间进行标记,并在实地调研中着重探究变化原因。根据当地居民和村民的访谈记录,可以得知建筑的变化并不是进行拆除重建,只是进行顶棚加建。

从空间肌理分析图上可以看出,主街的线性空间较为明显。因为建筑建设的自发性,产生许多由错位排列形成的公共空间,例如大榕树幼儿园的出入口空间。南北走向的主街与东西两侧的巷道相连,主街的宽度约 5m,可以容纳一辆小轿车通行,而巷道的空间较窄,宽度由 1m 到 3m 不等,只能容纳非机动车通行。总而言之,主街的南北方向可满足日常生活和交通的功能,两侧建筑排列虽然凌乱但带有一定的秩序感,这在实际体验中同样可以验证。

在厦门市蔡塘社区的研究中,现场共发放问卷 50 份,并成功回收了全部 50 份问卷。为确保

研究的准确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评价者年龄结构差异对社区空间认知偏差,在调研过程中随机挑选 20 位老年人以及 30 位中青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 SD 语义差别法了解社区居民对于主街空间的满意度,发现大多数使用者对于街道的业态活力和丰富度评价较高,同时由于街道位于社区地理中心,可达性以及使用频率也较高,街道的设施服务可以较好的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不过由于主街的街道立面以及沿街空间均是自发形成,界面平整度、环境卫生质量的满意度偏低,但对于主街街道空间的整体满意度较好。

### 2.2.2 社会空间形态

(1) 日常活动与民俗节假日活动的改变。蔡塘社区的现状发生显著变化,许多村民已迁居别处。原住民住宅部分出租给外来人口以获取租金,另一部分则保留作为祖宅,仅在节日或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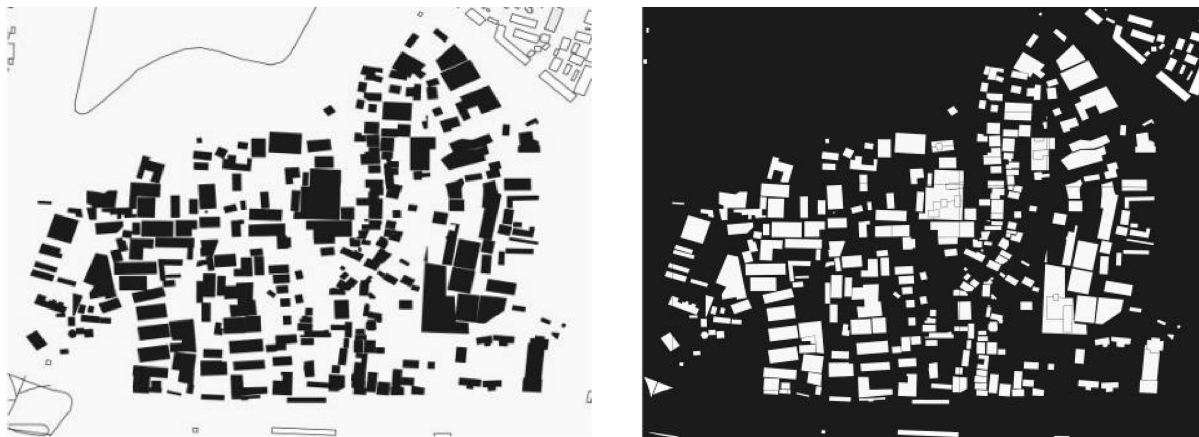


图 10 蔡塘社区图底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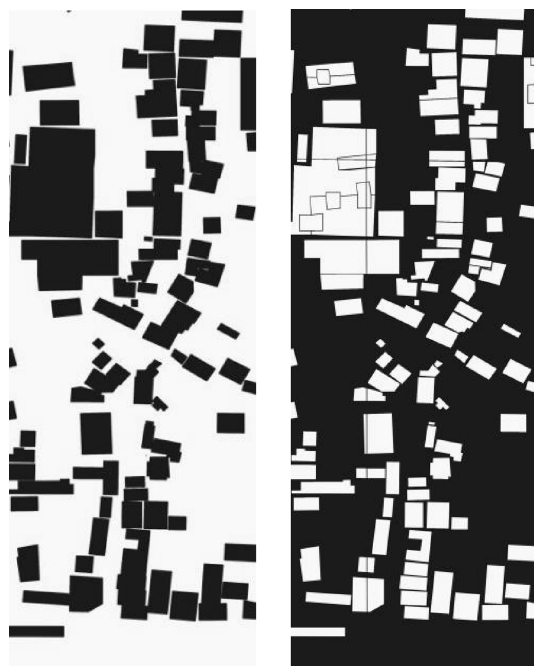


图 11 主街图底关系

典时返回设宴团聚。每日午后,蔡塘主街出入口常有退休大爷自发聚集,打牌下棋。同时,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成为老人们日常活动的热门地点。与此同时,蔡塘社区的上班族生活节奏快速,沿街店铺日复一日地经营。在一些开敞空间中,有家长们常带着孩子们玩耍,然而,也有一些老旧的院落由于长期无人居住而空旷无人。

访谈一位社区中的原住民李奶奶:“如今,我们所居住的房屋条件显著改善,社区内配备了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极大便利了日常生活。日常活动多集中在各自庭院中,夜晚在社区广场还

有广场舞等活动;节假活动由居委会在社区中心举办的晚会取代原来的庙会等传统民俗活动。”

(2)邻里关系的改变。蔡塘社区外来流动人口众多,占比超过 90%。在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交往中,文化差异成为主要障碍。这种差异体现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上。厦门通行闽南语,外地人口难以与当地顺畅沟通。问及邻里关系,在蔡塘社区居住了十五年的一位大爷表示,相比于十几年前大家相互走街串巷的集体生活,现在随着本地人口的流失,流动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大家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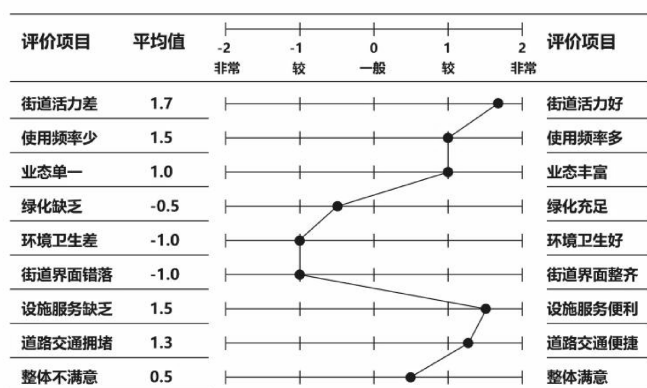


图 12 蔡塘村民空间感知 SD 曲线图



图 13 社区入口场景



图 14 社区庭院场景



图 15 社区幼儿园场景

少了许多,交流的场所主要是自家门前的院子和老年活动中心,休闲之余也会一起相约打牌。

### 3 空间视角下城中村演变内在机制分析

#### 3.1 电商经济兴起影响临街商铺空间格局

通过对蔡塘主街一位卖奶茶的店主的访谈中了解到,蔡塘主街的空间形态变化近二十年来受国家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较为明显,店主是二十年前从漳州迁至蔡塘社区,起初是从事批发和售卖服装谋生。但是随着 2010 年以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兴起,实体服装产业的客流量逐渐被电商平台分流,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热衷于网购消费,线下店的服装款式更新慢、价格高,与网络上新潮、购买方便、价格低廉的服装相比明显占据下风,因此店主在 10 年前后改行做了餐饮行业。主街多家店的店主均指出,网络电商的兴起对主街沿街的业态带来许多变化,以往的传统服装、副食、网吧等业态逐渐被年轻人所热衷的奶茶、潮牌、体验馆等新兴业态所取代。沿街的

空间也由以往的地摊空间转变为了更加齐整、更加精致的空间形态。沿街整齐的店面空间与背后一墙之隔的杂乱阴暗的城中村空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根据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的实践”指的是空间自身的实践,包括空间性生产的实践和生产性的空间,包括居民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及社会互动。空间的形态是社会关系的映射,社会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导致空间发生变化,电商经济的出现使得社区居民的消费方式发生改变,当地居民和店铺店主之间的消费关系发生了转变,居民不需要实地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商家纷纷都选择外卖和快递的形式,也不需要大面积的门店空间,这种电商文化因素影响居民对空间的感知和体验,从而影响表征的空间,反映到现实中表现为主街两侧的店铺占地面积也逐渐变小。

#### 3.2 周边地价升值导致街道空间密度提高

通过十年前的街景地图可以发现,在政府还

未将蔡塘社区划进拆迁范围之前,主街的街道空间肌理分布相对松散,建筑之间留有2-3m宽的巷道空间,构成蔡塘社区交通系统的毛细血管,对于地块内部的居民来说,其出入都十分便捷,社区内部还留有斑块状的公共空间,老人孩子们会自发聚集在这里聊天玩耍。但是随着厦门岛内城市发展建设逐渐包围蔡塘社区,BRT轨道线、地铁2号线以及蔡塘广场等大型城市公共及商业设施的建设,带动蔡塘社区周边地价的提升,最直观的影响便是蔡塘社区周边老旧建筑在近些年来被大量拆迁,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建筑,例如市政大厦、古地石安置房、蔡塘广场等。蔡塘地区的地价也在政府征地政策的带动下大幅提高,地价的提高带来隐形的经济效益,让社区内有房产的村民意识到更高的地价意味着更高的房租和利润,因此本地有产权的村民们纷纷通过改建、加建违章建筑、分割住宅空间等方式尽可能的提高其出租面积,以获得更高额的租房利润,从而导致了主街两侧的街道空间逐渐变得拥挤杂乱,从主街向两边延伸的小路也被各类临时摊点、临时厕所、辅房所侵占,原来在建筑之间老人和孩童玩耍的开敞空间也被加建的住宅楼所占据(如图16所示)。

根据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表征”是指对空间的构想和规划,通常由政府、规划者或资本主导。资本通过空间表征推动城中村的改造和开



图16 村民违章加建用房

发,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城中村的空间可以看作作为商品,其生产和再生产会受到资本逻辑的驱动,随着周边用地开发带来的蔡塘社区地价提升,刺激了村民违章加建的热情,但由于主街是蔡塘社区主要的步行干道,空间被侵占的程度较轻,但是街道背后老人和孩童们玩耍的公共空间、建筑围合的庭院空间则被大量侵占。城市开发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的正规性建设和非正规性建设,其中城中村主要是非正规性建设下的产物,虽然一定程度上,通过当地居民的自组织建设可以有效满足当地居民自身的生活需求,但是每个人的自建活动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脱离了公共权力管控的自发建设就会产生负外部效应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蔡塘社区的公共空间之所以被违章建筑所侵占,地价的升值是主要原因,但这背后是政府缺乏对于建设和地价升值的管控缺失所导致的(如图17所示)。

### 3.3 人口年轻化使街道空间业态更加精细

通过询问蔡塘社区居委会,了解到目前社区外地人占总人口比例在90%以上,多数为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社区的人口年龄构成逐渐年轻化。访谈中了解到,蔡塘社区的年轻人是近些年随着BRT地铁线和轨道2号线的建设而快速增加的,由于蔡塘社区区位条件良好、交通便利,而且房价相对只有600-900元左右,使得大部分来厦打拼的年轻人选择在蔡塘居住作为过渡,



图17 村民私搭电线造成安全隐患

蔡塘社区虽然人口构成年轻化,但人员流动性也相对较大。主街两侧业态的变化是通过市场所导控的,蔡塘社区人口年轻化和高流动性的人口特点使得主街的业态构成发生变化,过去沿街业态多是服装批发、餐馆副食以及水果摊贩,现在大量的服装店变为奶茶店、蛋糕店、零食坊等吸引年轻人的业态,原来的线下实体店受电商经济影响纷纷倒闭,转变为了各类电子设备、化妆品的体验店。原来为老年人和儿童提供的娱乐活动场所,如社区活动中心,如今也成为了年轻人活动的网吧、台球室、KTV 等。从一位在街边下棋的大爷口中,我们得知,蔡塘社区中生活的老年人,严重缺乏户外活动场所,由于年轻人是目前消费的主力人群,市场迎合这部分人的行为偏好,占用了原本属于老年人的活动场地,现在社区内的老人,部分选择去更远的地方活动,或者像他们一样在街边打牌,还有很大一部分只能留在家中。

根据空间生产理论,“表征的空间”是指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它处于被支配和消极地体验的地位,通过居民日常生活实践和空间表征交织而成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外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其社会结构和关系对城中村的演进有着深刻的影响。人口聚集与需求驱动会驱使城中村商业活动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街道空间业态发生变化。社区中的年轻人成为消费的主力人群,使得市场为迎合这部分群体的生活需求而淘汰了传统的服装、批发、电子专卖等产业,引入了更贴合年轻群体的体验店、高档餐饮、零食铺等新兴业态。主街沿街业态的变化导致了空间形态的变化,因为以往商业需要通过大面积商铺招揽人气,而在电商经济时代,商铺通过网络平台便可出售商品,大面积的门店意味着更高的租金,因此新的业态往往其店铺空间较小,整条主街的空间形态也由大块分散式的空间转变成小块精细化的空间。

#### 4 结语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产物,因其

复杂的权属与利益纠葛而备受学术界关注。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厦门市蔡塘社区为例,深入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过程,并总结了近十几年来蔡塘社区空间形态演变的三大内在驱动机制:第一,电商经济打击社区实体产业带来街道空间更加小规模化;第二,周边地价升值导致街道空间密度提高;第三,社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影响了街道空间向更加多元、精细化方向发展。

然而,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在未来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并平衡各方利益主体的需求,确保外来人口也能享受到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sup>[14]</sup>。同时,应充分利用城中村改造的契机,推动片区整体升级,以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中国流动人口忧思录[J].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1993, (Z1): 53.
- [2] 景国胜, 宋程. 数据驱动的城市更新与交通治理协同探索——以广州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05): 48 - 55.
- [3] 陈中, 沈陆澄. 潮汕传统村落空间的生产与保护规划研究——以汕头市沟南村名村建设规划为例[J]. 南方建筑, 2015, (04): 30 - 35.
- [4] 张京祥, 胡毅, 孙东琪.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 2014, 29(02): 1 - 6.
- [5] 蓝宇蕴. 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05): 147 - 153.
- [6] 李培林.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01): 68 - 179 + 209.
- [7] 周春山, 杨高, 王少剑. 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6, 36(11): 1643 - 1653.
- [8] 刘文清. “城中村”居住形态的演变及改造——以南通市崇川区为例[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3): 124 - 127.
- [9] 陈静. 城中村的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郑州

- 市为例[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04): 21 - 24.
- [10] 全德, 冯长春, 邓金杰. 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以深圳特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03): 437 - 446.
- [11] 刘毅华, 陈浩龙, 林彰平, 等. 城中村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演变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05): 126 - 134.
- [12] 张京祥, 赵伟. 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J]. 城市规划, 2007(01): 63 - 67.
- [13] 赵艳莉.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广州市“三旧”改造解析[J]. 城市规划, 2012, 36(06): 61 - 65.
- [14] 邵任薇. 城中村改造中的政府角色扮演: 安排者、监管者和协调者[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12): 125 - 128.
-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陈焯, 1996年生, 男, 广西梧州市人, 硕士,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更新、城市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Email: 1219552421@qq.com

---

# Research on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Villa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 ——Case Study of Caitang Community in Xiamen City

CHEN Ye<sup>1,2\*</sup>

(1. Guangzhou Transport Plann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Guangzhou 10030, China;

2. Guangdong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510030, China)

**Abstract:** Urban village is a product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which is not only part of the urban space, but also is crucial duri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This study takes Caitang Community in Xiamen C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its micro-physical space using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With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history oral an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patial forms of Caitang Community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internal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Caitang Community primarily involve three aspects: industry, land prices, and population. The rise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er-scale shops along the streets in the community.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land prices has increased the density of street space. The youthfulness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has influenced the refine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business types in street space.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are analyzed for Caitang Community, which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al idea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illages.

**Key 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spatial evolution; urban village; Xiamen City; Caitang Community